

兄弟之盟: 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外交

刘晓晨

【摘要】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动物作为特殊的外交礼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动物外交的推行受到当时中国向苏联学习热潮的影响。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无论是动物园的设计、动物的饲养方法、动物外交的模式都受到苏联的影响。两国之间有频繁的动物交流活动。但中国向朝鲜赠送的熊猫和其他珍稀动物数量更多、质量更优。这种对外交往是高度政治化的,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动物外交可视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晴雨表之一,这一模式时至今日依然存在。

【关键词】 冷战; 中国; 动物外交; 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

【中图分类号】 K271; D8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5)02—0166—09

【作者简介】 刘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00241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古往今来,世界各种人民都有以互赠花鸟鱼虫增进友谊的传统。”^①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新中国开展了以熊猫等珍稀动物为标志的“动物外交”。这种外交活动以开展对外动物交换、开展学术交流、合作保护野生动物等活动来展开。中国动物外交政策的实施,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对于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又成为它们在这一领域的“引路人”。冷战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前,中国的动物外交活动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色彩,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官方外交的补充,更多地被赋予了官方性质。

关于中国的动物外交的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上,主要针对的是“熊猫外交”。^②近年来也逐渐有国内学者开始利用解密档案研究中国的对外动物交流。^③本文立足于北京、上海市档案馆的相关档案文献和相关著作,^④以新中国政治环境和外交活动的演变为脉络,从国内

① 《长颈鹿与中非友谊》,《人民日报》1983年1月16日,第7版。

② 目前在学术界就动物外交这一问题尚未有完整而系统的相关研究。“熊猫外交”的研究,一类是基于生物学的考量;其余多是从民间交流、民间外交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和论述。生物学角度的代表作是《卧龙的大熊猫》(胡锦矗、夏勒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和《大熊猫研究》(胡锦矗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科学史类工具参考书如《大熊猫》(朱靖、李扬文主编,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地回顾了大熊猫作为对外交往的历程。国外学者对熊猫及其对中国政治、外交影响的研究,代表作有G. B. Schaller《最后的熊猫》(The Last Pand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以及H. Nicholls《熊猫之路》(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 Open Road Media, 2011)。日本学者家永真幸的著作《熊猫外交》(パンダ 外交株式会社メディアファクトリー 2011年版)系统考察了熊猫在中国从害兽到国礼的演变过程。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和北野充在其编写的《公共外交: 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日〕金子将史、北野充编,《公共外交》翻译组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中,亦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熊猫作为公共外交的载体,对美国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③ 有部分记者和学者利用外交部公开的70年代中国对外赠送熊猫的档案,撰写了相关文章。如孙桂华、夏俊的《“熊猫外交”的秘密往事》(《新一代》2007年第3期)。近来,亦有中国学者开始利用国外解密档案,研究中外之间的动物交换。张民军的《中英“麋鹿外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使用了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FO),详尽地还原了50年代中英两国试图通过麋鹿打破两国关系的坚冰的过程。

④ 各地方档案馆编辑的一些资料选编中偶尔也会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如北京市档案局、莫斯科市档案管理局编《北京与莫斯科的传统友谊——档案中的记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中,就保留了50年代中苏两国关于互换动物的一些珍贵的原档影印件。此外,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的《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国际双向互动的视角探讨冷战背景下新中国的动物外交与苏联式的动物园建设理念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考察在跨国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原先用于观赏、教育大众的各种动物,如何成为对外交往的一种媒介和手段。

一 社会主义动物园的建设与动物外交的肇始

动物外交的前提,是该国有数量充足、种类繁多的动物以及动物们栖居的场所——动物园或类似机构。法国学者埃里克·巴拉泰在《动物园的历史》一书中认为,近代以来,动物园的功能和定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他指出,动物园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满足欲望的历史。到了20世纪,动物园是公众对自然向往的寄托,也是窥探陌生世界的窗口。^① 这股变革之风在20世纪初吹到了北京城。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筹办的京师农事试验场,其功能一方面试播试种国内外的花卉、果蔬和五谷,另一方面也开始逐渐对游人开放,展览园中有从德国购买的雄狮等动物。民国时期,上海等地也逐渐有了小型的私人动物园,但是规模都难以满足游人休憩观光的需要。

1949年10月新政权建立之后,在“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率先和苏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加强向苏联的学习,在接受大量援华顾问和专家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外派人员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交流。^② 动物园的建设以及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进行动物交换一事也被提上了日程。50年代初,按照中央的指示,北京决定按照苏联模式兴建动物园,派出人员出访苏东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外进行动物交流。这些活动以北京动物园为主,上海、广州动物园等一线城市动物园为辅。

北京动物园作为国家级的公立动物园,主导了国与国之间的动物交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国外赠送的18只大熊猫均为北京动物园提供。^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中国的国家级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动物园的具体建设过程中,设计方案、指导思想、宣传方针乃至饲养方法均深受苏联的影响。为使动物园能具“社会主义”特质,北京动物园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对馆舍进行了改造和建设。动物园的性质是一个集中饲养大量野生动物的地方,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动物园长期以来都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动物园的任务是要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它亦是一个给游人休息的很好的场所。^④

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在动物园角色定位上和西方世界出现了观点分歧。在当时的苏联生物学界,科学家们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着力宣扬米丘林向大自然索取的观点。米丘林的学说,当时在中国接受度很高,博物馆的展厅里会挂起米丘林的画像和语录,^⑤ 比如那句最著名的“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青睐。从自然那里拿过来,这是我们的要求”。这些观点对自然史博物馆(包括动物园)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苏联式的动物园要积极宣传进化论、宣传米丘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学说,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动物园建设无一不深受苏联的影响。

苏联式的博物馆和动物园不仅强调要贯彻和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米丘林的征服自然的学说,还要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和动物园科研、科普和教育群众的功能。^⑥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提供的一份总结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对动物作用和动物园任务的理解“动物园的任务不仅是满

① 埃里克·巴拉泰《动物园的历史》“序言”,乔洪涛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 乔轶伦《北京动物园还是一个接受和派出外交“使节”的地方》,《人与生物圈》2006年第4期。

④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关于苏联专家规划动物园的总结》,1954年8月24日,第5页,B326—5—1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 甄朔南《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海峡两岸博物馆学人与全球化的对话论文集》第9页。

⑥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关于苏联专家规划动物园的总结》,1954年8月24日,第2—5页。

足游人的好奇、观赏和乐趣;更重要的动物园是一个进行文化教育科学普及的场所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机关;资本主义国家的动物园单纯为了游人的观赏休息而无任何科学教育意义或者虽然有科学研究工作,但仅仅限于少数科学家而不能普及于广大人民之中。”^①宣传中明确提出动物园的任务是:

1. 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祖国以及世界上有多少动物及其分布;
2. 宣传动物对人类的利害关系,以及如何保护有益的动物和防止有害的动物;
3. 让群众认识动物的发展演化过程,说明动物与人的来源。动物园负有责任说明动物是由低等演化到高等,而由于环境的影响所有生物是不断发展着的,有力地驳斥那种所谓人是神创造永远不变的荒谬理论;
4. 让群众知道自古以来人类就注意了驯养动物把野生动物驯养成为家畜而且逐步改变了品种,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说明人类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宣传米丘林的学说,使动物对生产和人类财富作更多的贡献;
5. 帮助群众特别是学生了解其他有关动物科学的各种知识,如动物生活习性、病理、繁殖等。^②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对动物园的定位更多地强调其社会功能、教育意义以及对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这些观点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动物园的建设理念。

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中国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观赏动物饲养、繁育与展览的管理体系与模式,但苏联动物园建设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为了在种类数量上求大求全和达到宣传“人定胜天”的要求,加之没有制定相应的种类划分标准,各地动物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纷纷派出工作队赴边远地区大肆捕猎珍稀动物。如为了获得宣传“进化论”必不可少的猩猩,上海动物园曾专门派出工作队前往东南亚和海外。^③1955—1957年,北京动物园野生动物搜集站分别搜集到530、659和1106只动物。^④频繁的捕猎和落后的运输技术造成的高死亡率导致一部分珍稀动物数量急剧减少。“50年代缺乏经验,造成肉食动物咬坏笼箱险些逃逸;大型草食动物及走禽、雉鸡等鸟类撞伤、撞死;爬行动物钻出笼箱;通风不良造成动物中途死亡。”^⑤

随着动物园的扩展和完善,同时也为了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尽可能地搜罗各大洲的标志性动物,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动物交换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由于动物地域种类的差别,无法在划定动物交换类别上直接照搬苏联,因此中国最初自行制定的标准并不科学。^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司和地方部门对划分标准提出了意见,经过一系列讨论,于1963年重新制定了一份新的划分标准,对原有的分类进行了进一步调整。^⑦这份标准对此后的动物保护和交换产生了深远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关于苏联专家规划动物园的总结》,1954年8月24日,第3页。

②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关于苏联专家规划动物园的总结》,1954年8月24日,第3页。

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园林处申请外汇从国外进口动物的批复》,1973年,第137页, B326—1—57—13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杨小燕主编,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页。

⑤ 《北京动物园志》,第172页。

⑥ 《关于我国珍贵动物出口问题的规定》,1959年4月1日,第40页, 117—01117—1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国务院制定的这份报告,是按照动物种群数量来确定动物出口种类的划分原则。其中第一类为我国独有的最珍贵的品种,只在必要时可由中央控制对外赠送,此外一律不得出口,包括大熊猫、小熊猫、东北虎、雪豹、蒙古野马、白唇鹿、金丝猴、丹顶鹤、扭角羚9种珍稀动物;第二类是比较珍贵的动物,只供动物交换和送礼等用,不做贸易出口,如蒙古野驴、华南虎、大鲵鱼、扬子鳄等13种;第三类是数量较多的我国特产的野生动物,如锦鸡、长尾雉、犀鸟等,数量较多,可以作为商品,限量出口。

⑦ 《北京市园林局关于我国珍贵动物出口问题的请示报告一文的修改补充意见》,《关于我国珍贵动物出口问题的规定》,1963年9月20日,第45—47页, 117—01117—1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原列入第二类中的野牦牛和野骆驼,是我国的特产(仅产于我国),且数量极少,对科学研究和展览都有很高的意义,被重新划入一类。原列入第一类中的东北虎、雪豹和小熊猫,主管部门认为其并非我国的特产动物,不应控制过严,每年少量的输出,既不影响产地数量减少,又不致降低其珍贵性和经济价值,因此应列入第二类。原划入第二类的华南虎、华北金钱豹等动物,被划入第三类中,可适当地外销以换取外汇。

影响。受创最重的是一些不在一类保护名册中的动物。在出口创汇的指令下,这些动物难逃被捕猎的命运。如被划入第三类的华北金钱豹,由于大量捕猎,目前已处于濒危等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皮张收购记录,20世纪60年代捕获1750只,70年代捕获了1224只,80年代种群继续严重下降。”^①命运相似的还有小熊猫。从1953年开始,截至1998年,野外捕捉2000余只,其中有100余只被运往国外用于动物交流。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小熊猫的种群数量。^②

尽管动物外交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但中国很快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自己的规则。比如要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交换要求,交换的品种甚至可以是最高等级的大熊猫、白唇鹿等珍稀动物,尤其是具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大熊猫是只赠予社会主义盟国的最珍贵的礼物;中国和亚非拉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进行着频繁的动物交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以防范为主,对于他们提出的交换动物的要求,能推则推,能拒则拒。在交换原则上,尽量保持动物价值的相当,多是接受国外赠送的大型动物,中方回赠以中小型动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秉着“平等互惠、互通有无、友好往来的精神,配合当前国家的政治任务进行”。^③

二 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物外交

中国官方很早就认识到要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经验,积极发挥动物园的作用。50年代初期,北京动物园的前身西郊公园和苏联方面已经建立了通讯联系。1951年5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对西郊公园的工作作出指示:“西郊公园有发展前途,宜建成大规模的动物园,作长远打算,如虎豹山、猴山等建设及研究动物的管理方法,有机会可能派人去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参观动物园,吸取经验,以扩充首都动物园。”^④

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动物园的指导源于当时中国在动物馆舍方面的建设经验不足。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赠送给中国少年儿童一头大象,由于中国当时缺乏建造“象房”的技术,只得向苏联求助。加之西郊公园内原有动物园的兽舍大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前修建,已不适合游览观赏。1954年3月北京市园林处决定改建并新建兽舍和动物活动所。同年6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园林处决定举办动物管理人员训练班,聘请苏联莫斯科动物园主任萨斯诺夫斯基和兽医奥列安德诺娃来华在西郊公园讲学,传授经验。他们来到中国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国规划设计新型动物园。萨斯诺夫斯基和兽医奥列安德诺娃先后前往北京和上海培训人员,指导动物园的建造和设计工作。苏联专家举办的“动物管理人员训练班”,历时33天,各地共有50余人参加,仅北京动物园就有14人参加。^⑤苏联专家的主张和建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在座谈会上“讨论苏联专家等提出的动物名单;要增加鱼类的饲养,搞好将来的水族馆;增加杜鹃、丹顶鹤等有文化性的动物;增加展览无脊椎动物;目前动物园动物不全,可用图案与动物分布图作补充,进行动物知识的普及;科学院与动物园应更多地联系”。专家还建议动物园不能作为文化休息公园,晚上不能开放等等。^⑥

上海动物园的情况和北京比较类似,在选址、建设的过程中也颇费了一番曲折。195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献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头大象“南娇”交给上海饲养展出。上海当时只有几家私营的小型动物园,“南娇”的到来推动了在上海建设新型动物园的构想。在得知苏联专家在北京访问的情况下,1954年7月,上海市工务局派出一批工程技

① 周秀佳、徐宏发、顺庆生主编《中药资源学: 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② 汪松主编《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兽类》,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 《市人委关于国际交换动物的情况和建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机构的请示和市人委与各有关机关的来往文书及园林局交换动物的请示报告》,19560101—19571130,第59页,002—009—00135,北京市档案馆藏。

④ 《北京动物园志》,第13页。

⑤ 《北京动物园志》,第277、291页。

⑥ 《北京动物园志》,第291页。

术人员和动物园管理人员到北京动物园学习,并约请在京的莫斯科动物园主任萨斯诺夫斯基商议建园事宜。^①8月,萨斯诺夫斯基与奥列安德诺娃访沪,先参观了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的小型动物园,随后又协助实地踏勘了西郊公园(原外侨高尔夫球场)、龙华苗圃、华泾长桥镇等三地,最后决定将西郊公园扩建为动物园。两位苏联专家在沪期间,还和上海市动物学方面的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座谈,谈了他们对于动物园的看法。^②

动物园建设完工后,随之面临如何为园中添置以供展览的各类动物的问题。对于本国没有的一些品种,只能通过购买和交流的方式向他国获取。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新中国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动物交换成为了仅有的选择。1960年5月6日,北京市园林局向市外办、中央对外文委作了《赴苏联商谈交换动物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交换动物的工作,首先的目的是加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通过交换动物以互通有无、交流文化,力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动物园文化科学事业方面的繁荣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换动物的工作,我们将交换动物工作看成是争取和平和文化交流及阶级斗争的工具。”^③作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动物交流首选国家自然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1951年6月9日,苏联中央动物园园长写信给北京西郊公园,表示愿意用苏联的特产动物如白熊、棕熊、雪豹等换取中国特有的各种兽类如猴子、大象、虎、豹和爬虫类。^④中方应对缓慢,8月苏联中央动物园园长再度写信给中方,催促中方尽快解决交换动物所需要的官方手续并尽量在当年完成动物交换。^⑤但是,由于动物交换一事涉及林业部门、外事部门和文化部门,行政审批繁琐,直到1952年,西郊公园(今北京动物园)才有所动作。西郊公园在2月先交换给捷克斯洛伐克动物园17种59只动物,^⑥后在11月根据中央交办的关于国际交换动物的指示以及国外提出的要求,派出由柳林溪等6人组成的代表团携带动物访问了苏联、捷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家的动物园,初步建立了国际间交换动物的关系。柳林溪等人随团带去了华南虎、棕熊、恒河猴等数十只动物以备交换。^⑦随后,根据波兰的要求,中国与波兰也建立了交换关系。其后与民主国家交换动物的关系就逐年发展,特别是与苏联,每年均有4至10批动物的往来。^⑧1953年2月,中方接受了第一批来自苏联的交换动物。苏联中央动物处运送过来的动物包括“非洲狮1对,北极熊1对,白狐2对,鹧鸪1对,小鸟20只”。^⑨同年,中方派出了以北京市动物园陈列室主任黄海为首的相关人员再次前往苏联开展动物交换工作。^⑩

随着对外动物交流活动的扩大,1954年5月1日,北京市西郊公园成立了专门负责该活动的机

①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绿化管理局编著《上海名园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389页。这批人员为工务局园场管理处的程绪珂、吴振千、虞颂华、顾正和上海市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徐景猷。

②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关于苏联专家规划动物园的总结》,1954年8月24日,第2页,B326—5—1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 《园林局关于国际国内动物交换工作意见、印尼动物园代表团来华访问接待计划、动物园大熊猫、犀牛死亡的报告》,第11页,19600201—19601130_002—012—00143,北京市档案馆藏。

④ 《苏联中央动物园园长就交换野生动物及交换动物种类等事宜致北京动物园的信》,1951年6月9日,北京市档案局、莫斯科市档案管理总局编《北京与莫斯科的传统友谊——档案中的记忆》,第41—42页。

⑤ 《苏联中央动物园园长阿乐吉鲁就请求解决交换野生动物及办理官方正式手续事宜致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函》,1951年8月6日,《北京与莫斯科的传统友谊——档案中的记忆》,第43页。

⑥ 《北京动物园志》,第181页。

⑦ 根据现有资料,这批动物中有14种39只交换给匈牙利布达佩斯动物园,5种10只交换给民主德国莱比锡动物园。

⑧ 《市人委关于国际交换动物的情况和建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机构的请示和市人委与各有关机关的来往文书及园林局交换动物的请示报告》,第59页,19560101—19571130_002—009—00135,北京市档案馆藏。原文中的民主国家均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主要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⑨ 《北京动物园志》,第13页。

⑩ 《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派黄海等人赴苏联交换动物》,1953年6月8日至7月10日,第2—3页,118—00204—04,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构“动物交换科”。同年,中央文化部报请邓小平副总理,先行拨款115亿元(旧币)的经费用于国际交换动物。^①苏联和中国的动物交换主要集中在1954—1959年,在此期间,北京动物园和苏联莫斯科中央动物园之间交换频繁,“每年2—3次,每次数十种几十只,双方均通过铁路运至满洲里,交换后各自运回,满洲里成为了中苏国际动物交换的重要口岸”。^②总体说来,从50年代初期一直到“文革”前夜,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换动物是很频繁的,但大多都是以二类、三类动物为主。中共对于赠送一类珍稀动物特别是大熊猫一事表现得异常谨慎。这段时期内,只有苏联和朝鲜接收过中方赠送的大熊猫。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作为苏共的元老级人物,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他在访华期间表示希望中国能赠送一对大熊猫给苏联。应其要求,经研究决定,以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名义挑选两只大熊猫“平平”(Ping-Ping)和“磬磬”(Qi-Qi)作为“国礼”赠送给苏联政府和人民。^③平平 and 磬磬是1956年在四川宝兴由北京园林局四川搜集动物组猎取的。^④50年代初期捕捉大熊猫极为不易,常常需要动物搜集队和当地村民在崇山峻岭中奔波数月才能捕获。“大熊猫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动物,极为罕见,很不易捕获,几年只捕到几只雌的……平平是北京动物园现有大熊猫中最好的一只。”^⑤彭真在草拟的信中这样说道。“为了聊以表示北京市人民对莫斯科市人民的兄弟问候,现谨将我们捕获到的中国产的一只大熊猫赠给你们。……愿我们两市人民的友谊世代地繁荣和发展。”^⑥但向苏联赠送熊猫一事波折不断。中方在1959年又赠送了一只雄性大熊猫“安安”(An-An)给苏联换回“磬磬”。盖因苏联当时的科研水平无法判断这两只幼年大熊猫的性别,他们怀疑中方赠送的两只大熊猫都是雄性,所以苏方要求调换一只雌性大熊猫到莫斯科。但是,后来发现被送往苏联的安安也是雄兽,无法进行配种,而1958年被送回国内的磬磬确是雌兽无疑。磬磬的命运后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成为了1949年以后唯一一只以交换的名义被“出售”的大熊猫——它以一个新的名字和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即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标志大熊猫“姬姬”(Chi-Chi)。1957年也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平平抵达莫斯科中央动物园不久,苏联于7月28日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作为特殊国礼的平平被看作是中苏两国青年友谊的象征。^⑦

苏联在收到中方赠送的大熊猫后,1958年9月向中国回赠动物的清单如下:斑蝶螈、黑天鹅、绒鼠。这些动物的级别并不高。此后不久,中苏两国的关系从蜜月期急速冷冻,走向分裂。北京动物园和莫斯科中央动物园之间的动物交换关系也开始变缓,从一年几十次交换变成了一年一次再到彻底消失。1960年苏联中央动物处交换2只黑猩猩、里加动物园赠送给北京动物园3只幼棕熊;1961年中方交换给苏联中央动物处10种139只,1962年6种50只。^⑧此后两国间的动物交换关系停滞不前,直到1984年由莫斯科动物园输入一对普氏野马,这才与苏联恢复动物交换关系。

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代初期也经历了一段蜜月期。民主德国莱比锡动物园在1953年赠送给北京动物园“非洲狮1对、美洲狮1对、斑鬃狗1对、棕熊1对、瘤牛1对、设特兰小马

① 1955年3月,中央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新旧币兑换比率是1:10000。115亿元旧币折合为115万新币。

② 《北京动物园志》,第181页。

③ 杨家声主编,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外事志》,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560页。又见四川省宝兴县政协文史委编《宝兴文史资料·第4辑》,1994年,第33页。

④ 《猎获三只熊猫》,《人民日报》1956年5月9日,第3版。

⑤ 《北京市市长彭真就北京市人民向莫斯科人民赠送大熊猫平平事致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波布罗夫尼科夫的信》,1957年4月10日,参见《北京与莫斯科的传统友谊》,第44页。另,捕捉到的平平实为雄性,磬磬为雌性。

⑥ 《市人委关于国际交换动物的情况和建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机构的请示和市人委与各有关机关的来往文书及园林局交换动物的请示报告》,第7页,19560101—19571130_002—009—00135,北京市档案馆藏。

⑦ 王文轩《大熊猫在海外的生活》,《科学之友》(A版)2009年9月。

⑧ 《北京动物园志》,第183、184、218页。

1对、麝鹿1对、孔雀1对、黄秃鹫1对”。^①很多动物如白狐、北极熊、美洲狮、斑鬣狗等都是首次在中国展览的珍稀动物。1958年6月18日,北京动物园建园50周年之际,收到了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缅甸、比利时、英国等15个国家动物园的贺电和贺信。^②但随着中苏分裂日益严重,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动物交换也越来越少。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之后,和中国保持有限度的动物交换关系的,只有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少数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同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动物交换。1960年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动物园交换来“鹈鹕6只,天鹅2只”。^③1965年,中国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赠送给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两只东北虎作为礼物。^④究其原因,中方主要是考虑到毛雷尔曾公开呼吁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⑤1964年,毛雷尔两次访问苏联、中国,就中苏矛盾进行调停。而中国同阿尔巴尼亚之间关系紧密显然也是中国政府在1962年主动赠送给阿尔巴尼亚大量珍禽的原因。^⑥“从60年代起,中国在自己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国为履行中阿双方签订的协议,要花费人民币100多亿元。”^⑦在这种背景下,为阿尔巴尼亚提供珍禽异兽作为礼物并不稀奇。

三 朝鲜、越南与柬埔寨:特殊的盟友

中国与苏联集团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动物交往,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呈现逐渐上升的势头,其中,与朝鲜之间的频繁交流最为引人注目。

在整个冷战阶段,中国向朝鲜赠送的动物,品种之珍稀、数量之庞大、次数之频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稳居榜首。中国对朝鲜的重视程度,从赠送大熊猫的数量可见一斑。1965年至1980年,中方先后共赠送给朝鲜5只大熊猫。^⑧对朝赠送动物,主要以北京动物园为主,时间跨度主要从1959年至1965年以及“文革”时期。

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朝关系一度陷入停滞。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⑨1956年,朝鲜发生了针对金日成的“八月事件”,此后“延安派”干部遭到大批清洗,造成中朝两党上层关系非常紧张。金日成曾向中国请求经济援助,但被中方婉拒。^⑩到1957年,随着中苏同盟之间分歧日益明显,中国需要加强同朝鲜之间的关系,中朝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在1957年9月接待了金一率领的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满足了朝鲜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此前这一要求曾经被中方拒绝。^⑪

中朝之间的动物交流始于1959年7月。中国方面先以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名义向朝鲜赠送了一批珍禽异兽,共计26种105只,分别为非洲狮、华南虎、鹈鹕、天鹅、珍珠鸡等。朝鲜方面回赠了12种40只动物。1960年中方再交换给平壤动物园6种126只(尾)动物,^⑫1961年5月中方又赠送

① 《北京动物园志》第14页。

② 《北京动物园志》第17页。

③ 《北京动物园志》第19页。

④ 《北京动物园志》第239页。

⑤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⑥ 这批珍禽包括:绿孔雀、天鹅、灰鹤、长尾雉、大天鹅、海南鹈鹕、绿斑鸠、斑犀鸟、灰果鸠等。

⑦ 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⑧ 胡锦涛《大熊猫研究》,第205页。

⑨ 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中朝关系历史真相》,《凤凰周刊》2011年第7期。

⑩ 沈志华、董洁《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⑪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活动的文件》,1957年8月24日至9月19日,第5页,117—00665—03,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⑫ 《北京动物园志》第183页。

给朝鲜一只华南虎。朝鲜方面回赠以“斑羚 1 对, 青鼬 1 只, 野鸽、斑鸠、隼各 2 只”。^① 同年底平壤动物园再度致函北京动物园请求中方交换大批动物。^② 因朝鲜方面提供的动物数量过多, 北京动物园直到 1962 年 8 月才准备妥当。中方为朝鲜提供了“金钱豹、食蟹猴、美洲野牛、猩猩、鹈鹕、鸬鹚等, 共计 14 种 375 只(尾)”, 由时任北京市人委外事处办公室主任田路和北京市动物园技术员李扬文二人(均为党员)护送至朝鲜。

面对中国方面的慷慨, 朝鲜方面对此也给予了分量十足的回应。朝鲜平壤中央动物园在 1963 年 7 月和 1964 年 7 月先后以平壤市市长姜希源的名义回赠给彭真市长两批珍稀动物。^③ 这两批动物也是 1949 年以来北京动物园接受的最大规模的赠送。作为对朝鲜方面慷慨馈赠的回礼, 中共在 1965 年首次决定赠送给朝鲜两只大熊猫, 还赠送了河马、扬子鳄等 15 种 56 只动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中共内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 对朝鲜劳动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朝鲜劳动党也不甘示弱, 中朝两国两党的关系再度破裂。1969 年珍宝岛冲突引发的中苏对立, 迫使中共调整了外交政策, 积极缓和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朝关系开始逐渐恢复。金日成 1971 年 11 月 1 日秘密访华之前, 经国务院 7 月 17 日(办字 1867)批准, 中国外交部决定以北京市革委会名义赠给朝鲜一批珍稀野生动物。^④ 但是因为北京动物园无法凑足计划赠送的动物, 因而决定由北京市秘密派人前往云南、四川、江西、青海、广东、上海等地搜捕。按照 1963 年修改的《关于我国珍贵动物出口问题》的规定, 这次计划赠送朝鲜的珍稀动物等级颇高, 其中野牦牛为一类保护动物, 岩羊、野驴、云豹、大鲵、长尾雉属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⑤ 这批赠送给朝鲜的动物经过了精挑细选, 以赠送给朝鲜的哑天鹅为例, 上海动物园从当时园内 16 只哑天鹅中, 挑选了大小各一对供北京来沪人员挑选。因担心小的一对天鹅不分雌雄不便于饲养, 又决定将小的留在北京, 将北京动物园的一对大的替换给朝鲜送去。^⑥ 由于捕捉不易, 各省市并没有完成预定计划。因此中共决定以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再次送给朝鲜两只大熊猫(凌凌、三星)以及黑天鹅、云豹等共计 19 种 26 只珍稀动物以示中朝友好。^⑦ 因之前赠送的熊猫死亡, 1979 年中国又赠送了一只雄性大熊猫丹丹给朝鲜。

除了赠送动物, 中方还积极帮助朝鲜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并接待了来自平壤的动物实习团, 安排其在中国进行考察。^⑧ 朝鲜中央动物园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于 1959 年创办的, 位于平壤郊区, 占地约 100 公顷。金日成要求要在 1959 年“八一五”之前建成平壤动物园, 当年 3 月, 朝鲜平壤动物园派园长郑明述一行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习动物园建设经验。^⑨ 他们前往上

① 《北京动物园志》第 19 页。

② 《北京市长彭真向朝鲜平壤市赠送动物事》, 1962 年 8 月 7 日, 第 43 页, 117—1340—06,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朝鲜方面提供的名单有“猩猩一对, 美洲野牛一只, 爪哇黑鹿 1 对, 鹈鹕两只, 孔雀两只, 华南豹 1 只, 牦牛 1 只, 黄猿一对, 长尾雉四只, 银鸡 2 只, 鸬鹚 2 只, 虎皮鸬鹚 50 只, 食蟹猴 1 对, 金鱼 300 尾。”

③ 《北京动物园志》第 236 页。第一批为“朝鲜豹、丹顶鹤、红海龟等”, 共计 14 种 26 只; 第二批为“朝鲜豹、豹猫、丹顶鹤、白尾海鸱、猓狸、黑秃鹫等”, 共计 31 种 142 只。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71)部新字第 60 号文件,《上海市园林处理处革命委员会关于赠送朝鲜一批动物中的哑天鹅问题的汇报》, 1971 年 8 月 30 日, 第 52、53 页, B326—1—49—50, 上海市档案馆藏。在文件后附录的表单中, 要求云南昆明支援红面猴 2 对、四川鸬鹚 3 对、海南鸬鹚 3 对; 四川重庆、江西南昌支援云豹 2 对; 四川成都支援石羊(岩羊) 1 对、长尾雉 3 对; 青海玉树支援牦牛 2 对、野驴 1 对; 广州支援眼镜蛇 10 条、黑尾蟒 4 对、大鲵(娃娃鱼) 10 条、鸬鹚 8 对; 上海支援哑天鹅 2 对。

⑤ 按照目前的保护等级, 这批赠送朝鲜的动物如大熊猫、岩羊、野驴、云豹、长尾雉等大部分都属于一类濒危物种。大鲵、海南鸬鹚、红面猴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青海支援的牦牛如果按照这次赠送的等级推测, 很有可能是野牦牛。野牦牛在 1963 年的意见稿中被认定为一类动物, 非国家特殊对外任务, 不准输出。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71)部新字第 60 号文件,《上海市园林处理处革命委员会关于赠送朝鲜一批动物中的哑天鹅问题的汇报》, 1971 年 8 月 15 日至 1971 年 9 月 8 日, 第 52、54 页, B326—1—49—50, 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 《北京动物园志》第 240 页。

⑧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关于接待朝鲜动物实习团的计划、简报》, 1959 年 3 月 20 日—1959 年 3 月 24 日, 第 1—16 页, C37—2—495, 上海市档案馆藏。这四人分别是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建筑监督部指导员姜龙海、平壤都市设计研究所建筑设计室设计师郑仁贤、平壤动物园园长郑明述和平壤动物园饲料部长金东哲。

⑨ 《上海市外联办关于朝鲜动物实习团外宾接待计划》, 1959 年 3 月 23 日, 第 1—16 页, C37—2—495, 上海市档案馆藏。

海,主要是学习动物园设计、兽舍兽馆建造以及动物饲养繁殖等课题,而中国在馆舍设计、饲料配制、繁殖技术方面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指导。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朝鲜在繁育黑熊、活熊取胆、活取麝香方面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90年代初,朝鲜中央动物园共有动物650种,其中外国赠送的有294种。^①这里面相当大的部分是中国赠送给朝鲜的。

与朝鲜相比,尽管中国同越南之间进行的动物交流起步较早,但两国的动物外交关系并不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越南国内长期战乱,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饲养环境。1953年6月(印度赠送给中国大象一个月之后),北京西郊动物园收到了胡志明赠送给毛泽东的两只亚洲象阿壮(雄)和阿邦(雌)。这两只大象由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代表赠礼,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代表毛泽东主席接受,在北京动物园内举行交接仪式。在此之后,由于长期战争,动物交流并不是越南最迫切的需要,河内动物园的饲养条件也比较有限。1960年中方以彭真的名义赠送给河内市市长陈维兴一批动物,有非洲狮、马鹿、天鹅、鸳鸯各2只。中方派出堵宏章、李扬文亲自护送到河内,“并在河内停留4个月,帮助越南在百草公园修建兽舍”。^②越南方面则在1962年通过总政外事处转来了回礼,是黑熊和豹猫各1只。^③在此之后,中越之间的动物外交基本归于沉寂。^④

除了朝、越,柬埔寨共产党在其执政时期也曾与中国方面有过动物交换,但柬方主要是赠送而非进行交换。1975年至1977年间,柬共赠送给北京市动物园大批爬行动物,包括暹罗鳄、泰国鳄、黑尾蟒、黄纹水龟,1978年8月又赠送了一只名叫“赞兰”的雌性亚洲象和两只雄性孟加拉虎。^⑤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频频赠予中国动物,凸显出柬共急切向中国靠拢、表达忠诚和友好的意图。

结 论

作为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在西方国家中延续了自形成以来一贯强调展览、休闲功能的传统,并偏重在人工环境下模拟“自然环境”对动物进行保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动物园更是将弥合“人”与“动物”的对立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并对所谓的动物交换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相比之下,源于苏联模式形成的中国的动物园管理及动物交流制度在冷战时期则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动物园既是社会主义公民游玩娱乐的场所,也是辅助官方意识形态教育的机构。同动物园紧密相关的动物外交在这一时期也被赋予了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党与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亲疏远近决定着包括动物交流在内的一切外事交往活动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政治化的动物外交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动物外交仅仅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附属品,动物外交的成功与否更多地是取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成败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而不在于动物本身。

(责任编辑:杜 倩)

① 肖岩、辛建军《关于朝鲜野生动物保护和利用的考察报告》,《天津农林科技》1994年第4期。

② 《北京动物园志》第19页。

③ 《北京动物园志》第218页。

④ 1975年7月,越南以范文同总理的名义赠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名叫“坎占”的雄象。

⑤ 《北京动物园志》第237页。

Academic Atmosphere of Zhejiang after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1 – 1864) —Researches Focusing on Dai Wang **XU Li – wang**

After Taiping Army was suppressed , the Neo – Confucianism thought prevailed. But the intellectuals in Zhejiang , with Dai Wa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 went against such thought. Dai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ists of Song dynasty and advocated the knowledge of Yan and Li. His academic road mirror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Education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Baoshan County **GAO Jun**

The rise of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an obvious social phenomen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hen it began to carry out its New Deal. A short time after the Learning Encouragement Agency System was carried out , local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restructured as education association. The role education association has play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education executive system and experience in study related activities was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Anti – Colonial Cultural Praxis of Japan’ 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in Manchukuo: A Case Study on the Sakubun School **LIU Chao**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ultural groups in Manchukuo , the Sakubun School , formed by Japan’ 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who moved to northeast China in their early years , strategically posed vehement criticism against the colonial rule. They worked hard in the intellectual arena ,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activities. All these cultural praxis not only undermined the legitimacy of Manchukuo as a puppet state , but also subverted the discourse formulated by “converted” Japanese Marxists that viewe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s an emancipatory anti – feudal enterpris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s , Gentries and Common People in Local Societies before , during and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from the Orphanage in Fenghua

CHENG Meng – xi

In Chinese society , the operation of charity care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government , gentries (social elites) , and common people played different roles before and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eeing from the whole , though the donation from local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were quite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ing of the Orphanage , the Orphanage could pull through many crises thanks to the timely money or food from the government.

Fate of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hip of New Democracy——Change of Shanghai before and after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HUO Xin – bin**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 the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 became tense due to the complicate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worldly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The Five – anti campaign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and imbalance of labor – capital relationship. From all these facts we could see tha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 capitalists as well 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during the country’ 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ith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LIU Xiao – chen**

The promotion of animal diplomacy of New China was influenced by Soviet Union ,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d frequent animal exchange activities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However , the pandas and other rare animals given by China to North Korea was superior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than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kind of diplomacy was highly political. To some extent , animal diplomacy can be regarded as

the barometer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still exists nowadays.

Property Right and Land Transference of Copyholder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UN Xiao – jiao

The copyhold tenure evolved from villein tenure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became a kind of land-ownership, which had no unfree traits and protected by laws. The types of land determine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opyholders, which divided into the copyhold of inheritance, for life and for years. The common law regulated that copyholders had no property rights, whereas in facts they could transfer lands through market or not. The land transferences of copyholders were ensured by seizin in deed.

Early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orld Terrorism

YU Jian – hua

The connotation of Terrorism va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re have bee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heories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eties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terrorism in the proper sense started in modern times. The terrorism internationalization becomes obvious since the year 1968 with more harm to the society. Terrorism then becomes increasingly illegal and shows the historical trace of externalization as an ideology.

Public Historiography and Oral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LI Na

Since its birth in 1970, the dialogue between public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 has begun. The two has similarities in such areas as discipline origin, memory study, way of historical demonstr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y cooperate in different ways in practice. This paper states these common concern and holds that thi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means a lot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public history that has just started in China.

Tendencies of Ideological History during the recent 20 Years—Discussion on Problem Awarenes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XU He – tao

By studying relevant research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reflections on Post-Enlightenment have influenced the horizon of ideological history research to a large extent since the 1990s. It is mainly embodied on four aspects: reassessment of enlightenment,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ll these researches help expand a wider research field instead of sticking to the traditional document study writing focusing on great thinkers.

Masterpie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odern China—On *French in Shanghai 1849 – 1949* by Guy Brossollet

MOU Zhen – yu

The book *French in Shanghai* by Guy Brossollet studies and quotes a lot of literature and official profiles from Archives of Fra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t displays the life of French in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Shanghai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The book not only offers the overall cognition of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of France, but also opens up many research areas for future overseas Chinese of French and other countries.

(葛鉴瑶 译)